

# 解放前后知识分子家庭婚姻关系的转变

——以仲素纯、喻世长夫妇为个案的考察

丁 芮

[摘要] 1949年以后,随着政治形态的改变、社会变革的发生,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女性从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开始改变为平等地位,婚姻中夫妻双方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这种转变在知识分子夫妻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前,喻世长和屯已恋爱几年,感情稳定,但喻世长是二人关系的引导者,时常觉得屯“不上进”。1949年后,屯在新时代的感召下,积极主动进行思想改造,自主意识得到明显提高,在家庭中二人的关系变为“携手前进”。在社会大变革中,政治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民众也会审时度势,自觉地调适。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婚姻关系的转变是国家推动与民众意愿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知识分子 婚姻关系 转变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维视野下的华北城市苦力行业与群体研究(1840—1956)”(19BZS125)

[作者简介] 丁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北京100009)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2021)06-0140-10

DOI:10.13761/j.cnki.bflc.2021.06.017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全面的变化,其中婚姻与家庭变革较为明显。妇女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女性从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改变为平等地位,婚姻中夫妻双方的关系也有调整。这种转变在知识分子夫妻中表现更为明显,以喻世长<sup>①</sup>和恋人仲素纯(屯)<sup>②</sup>为例,在1949年前,喻世长一直是二人关系的启蒙者、引导者,时常恨仲素纯“不上进”,1949年后,仲素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以及进入华北大学进行思想改造,在家庭关系中,仲素纯的自主意识得到提高,这种提高得到了喻世长的认可,二人的关系变为“携手前进”。

以往学界对于1949政权变动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侧重于有一定社会名望的大知识分子、作

为群体(整体)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思想改

① 喻世长(Yu shi chang 1916-1999)是我国著名民族语言学家,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音韵学研究。1939年,喻世长考取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43年毕业后,先后在河北省保定女子师范、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师。1948年4月1日入职北京大学,在文科研究所音乐律实验室,担任助教。1950年中国科学院组建,喻世长转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② 喻世长在日记中称呼自己的爱人仲素纯为屯。从喻世长日记的记载推测,仲素纯应该是从保定女子师范毕业后,1947年进入中国大学文学院文学系,1949年3月获得该校文学士毕业证书,时年23岁。1949年4月屯进入华北大学,1950年3月毕业后,分配至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1958年左右调到中科院民族语言所工作,与喻世长成为同行。五六十年代,仲素纯曾参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

造等方面<sup>①</sup>，而较少关注政权变动对于知识分子婚姻中夫妻双方关系调整的影响。在婚姻关系的转变中，除了政府的引导，男性的推动外，女性本身的自觉尤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触及内心的思想运动。而在这其中，婚姻中夫妻双方关系的调整，正是我们观察政权变动触及人内心的窗口。婚姻中，夫妻双方关系的调整涉及私人的复杂感情，一般不为外人所了解，亦不为外人道，而现存的喻世长日记，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素材。故，笔者尝试以普通知识分子喻世长的日记为主体资料，具体考察在新政权建立过程中知识分子家庭婚姻关系的变化，从中认识在婚姻家庭关系变化中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以及政权变动对民众社会生活深层的影响。

#### 一、1949年前，喻世长恨仲素纯“不上进”

喻世长1916年6月25日出生在天津市宝坻县，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4个妹妹，生活颇为贫困<sup>②</sup>。父母按照旧式教育对其进行严厉管教，喻世长难以和他们进行心理交流与沟通，觉得家庭是“冷酷的”<sup>[1]556</sup>，是对他的束缚，这造成了他敏感、脆弱、孤独的性格。家庭给喻世长带来困扰，促使他把自己的感情更多地投在恋人屯的身上。喻世长1939年考上辅仁大学之前，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有一次胜利的“抗婚”斗争，到北平读书工作后，与自己保定女师的学生屯相遇，并逐渐产生了感情，成为了恋人<sup>③</sup>。

屯接受了大学教育，追求婚姻自由，与喻世长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在生活上共同扶持，在思想上能够深入交流，互相理解。喻世长和屯在恋爱的过程中，都投入了真挚的感情，“彼此对待是真的”<sup>[1]39</sup>。特别是喻世长，忧心国家时局和工作，又被家庭所累，把屯当做快乐的源泉，精神的寄托，心灵的安慰剂<sup>[1]58</sup>。

现代婚姻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sup>[2]90</sup>。互爱就像是“砌房子的墙基一样，先打

好了基础，才能配合上木材、砖、瓦，造成房子。”不过，互爱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牢固的爱情，应当建立在工作好、学习好、思想意识好的基础上”<sup>[3]12</sup>。喻世长对于爱情的认识就是如此。他认为，自己和屯的结合是“纯感情”，但想要感情长久稳定，也应有稳固的基础。

五四以来，知识男性就肩负着启蒙、教育女性的责任。在1949年前，在与屯的恋爱中，喻世长一直以来都在生活上、学业上担负着教育、感化屯的责任。喻世长比屯大9岁，又曾是她的老师，在平时生活中对其多有指导，特别是在学业上，指导屯如何写论文<sup>[1]12</sup>，给她讲解文学知识等<sup>[1]89</sup>。1948年，国内政局不稳，喻世长关心时局，在自己进入北大有了稳定的工作之后，也关心屯的前途<sup>[1]101</sup>。但屯自从进入师专后，“始终没再努力向上的心情”，这使喻世长大失

① 孙丹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樊锐 《新世纪以来关于新时期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刘颖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研究述评》，《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谭献民 《建国以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综述》，《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侯德邻：《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评》，《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增刊）；滕艳丽 《十年探索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评》，《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张俊 《关于我国知识分子内涵问题研究综述》，《延边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吴敏先 《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政策及政策调整研究述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刘刚 《近十年来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研究综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2年；张浩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述评》，《理论界》2010年第3期；冯修青：《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观述评》，《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② 喻世长 《忆父亲喻训庭》，宝坻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宝坻文史集萃》，政协天津市宝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2000年版，第42-43页；喻如菊：《人生识字忧患始（代序）——忆长兄喻世长》，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 《建国日记》，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3页。

③ 喻如菊 《人生识字忧患始（代序）——忆长兄喻世长》，《建国日记》，第10、13页。

望<sup>[1]221</sup>。喻世长认为，如果屯“困守着旧式的家庭，不读书报，不做论文，不与我讨论生活问题，前途问题”，“到头来不过是个顶简单无味的人”，就不那么可爱了<sup>[1]111</sup>。

喻世长抱持引导者的思维，想要改变屯的“毛病”，希望屯能“无条件地”听他的话<sup>[1]221</sup>，劝她向自己学习时事，增加见闻<sup>[1]111</sup>。但屯在学业上总不太用功，虽然在中国大学读书，但对于自己的前途问题不是很上心，并认为自己就是跟着喻世长，不想什么好前途。1948年8月27日，屯与喻世长聊到学问事业上，屯推托不愿意深谈，喻世长追着问屯“人家多说我们的结合是纯感情的，对吗？”“如果除了感情以外什么也没有，那爱的基础是否欠稳固呢？”屯不能直接回答，说了句笑话“我努力也不过是跟了你罢了，还有什么好前途”。喻世长说“快不要这样说，你赶快出个名声来，然后任意去选择”，“难道你不知道我爱你与希望你成就这两种心是同样的热吗？”屯仍然没有回答，只说出两句“我离不开你”，“你心好”<sup>[1]141</sup>。喻世长非常不赞同屯的这种想法。

恋爱进入稳定期的二人日常生活已不全是你依我依、春花秋月了，他们早已考虑步入婚姻，并开始规划婚后的生活与事业。但是，正如这个谈话反映的那样，这一阶段二人相处的关系中，喻世长起着主导作用。屯的不上进使喻世长在某个时刻闪现出不想和她结婚的念头<sup>[1]111</sup>，但和屯恋爱了三四年，喻世长对屯有很深的感情，便想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屯在学问、事业、思想上进步，引导她领略“伟大深刻曲折美妙的人生”<sup>[1]201</sup>。对于屯的不用功、不上进，喻世长认为是因为屯的旧家庭造成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不能用功，希望早日结婚，二人在一起能有进步<sup>[1]131</sup>。因为屯还在读书，屯的家里希望毕业了再结婚。喻世长不满意屯受家庭封建意识的窒息，但屯听从家里的安排，喻世长只能督促屯慢慢接受他的“勉励”<sup>[1]130、143</sup>。

1949年12月，北平处在围城之中，国内形势逐渐明朗，喻世长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判断和平很快就要到来，想到新时代就要来临<sup>[1]226</sup>，内心充满了期望与向往。喻世长一贯认为，“封建势力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束缚，其实是最难堪的”，在新时代自己要同知识分子一起“粉碎封建的遗骸”，但屯并未表现得和自己一样。喻世长“恨她不上进”，还有一个原因是屯“进了中大，受了那里的影响，表现的不太好”，便“打架般地劝她努力”<sup>[1]233</sup>。不过，对于屯的前途，喻世长也充满信心地认为“是光明的”，因为“屯也可能发见学问之途径的”<sup>[1]230-231</sup>。

1949年1月22日，国共双方成立联合机构，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书》上签字，喻世长十分兴奋，认为和平很快就到了，喻世长和屯说到时局变化，“希冀着过一个好日子”<sup>[1]253-254</sup>。此时的喻世长开始慎重考虑前途，但因未参加革命工作，他对当时局势判断还不明朗，所以认为“一切局面混沌着”，自己的工作尚难确定，“能以什么样的光明与希望指给她呢？”<sup>[1]257</sup>带着对新时代的憧憬和不确定，喻世长和屯迎来了解放。

## 二、1949年后，仲素纯进入华北大学进行“思想改造”

随着解放区面积的扩大，共产党需要更多青年干部进行管理。为了将不同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改造成符合革命要求的干部，在1949年后，共产党开办了多所革命大学。其中，华北大学被誉为“华北解放区之最高学府”、“革命力量的一大源泉”<sup>[3]31</sup>。

1948年6月，华北解放区成立，同年8月24日，原晋察冀区华北联合大学与原晋冀鲁豫区北方大学正式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sup>[4]</sup>。按照中央的指示，华北大学主要是“担负短期政治训练班大量训练知识分子与工人的任务”<sup>[5]175</sup>。“华北大学是革命的大学，它与旧式大学有很大的不同”<sup>[6]</sup>，其办

学方针是，吸收大量的知识青年，将他们培养成为解放区各方面的建设干部。<sup>[7]</sup>

平津解放后，学生、教职员、公务人员、店员、工人及失学失业青年前往投考华北大学等革命大学者“络绎不绝”<sup>[8]</sup>。自1949年2月15日革命大学开始在北平招生，投考者极为踊跃，至3月15日，总数已达3万以上。据统计，投考华北大学者学生占半数以上<sup>[9]</sup>。北平联合办事处成立后的第二天，即使不关注时局的屯也开始认识到“时代变了”，中国大学的学籍不知会如何，开始烦恼前途和职业的事，喻世长安慰她说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门径”<sup>[1]261</sup>。

在恋爱的最初阶段，喻世长“看她（屯）是没一处不好的，永远具备着前进的因素的”，但在1949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感觉屯“颓废”了，虽不能“完全归罪于她”，但“多少是失望了”<sup>[1]288</sup>。喻世长一直认为，爱是要“带上一些条件”，“爱是要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的”<sup>[1]282</sup>，而屯在这两三年里，因为“对人生的认识不多”，以及家庭环境的原因等，与自己“在思想上已经有了个不小的距离”<sup>[1]288</sup>。喻世长不愿意怪罪屯，只好对屯的事情多考虑些，“劝告她多练些吃苦耐劳的事，多认识时代，储蓄能力，才能立于永久不落的地位”<sup>[1]282</sup>。所以，华北大学第一次招生，喻世长就关注到了。青年人员尤其是青年学子踊跃报名革命大学的氛围影响着喻世长和屯，屯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表示再有招生就去考<sup>[1]284</sup>。

因为报名者踊跃，华北大学等三所革命大学在第一次招生后，1949年3月开始第二次招生。《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招生广告，宣传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军政大学是培养新中国所需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群众工作等各方面干部的学校，毕业后由学校介绍适当的工作，号召青年人员“下定决心毫不犹豫的去投考”<sup>[10]</sup>。中共中央对革命大学的招生很重视，1949年3月9日致电华北局、北平

和天津市委，要求全力保障办学经费<sup>[1]163</sup>。

1949年3月13日，正在忧心屯前途的喻世长看到华北大学第二次招生的信息，很快就让屯报了名，并认真进行准备<sup>[1]289,294,310</sup>。经过初试、复试，屯被华大二部正式录取<sup>[1]314</sup>。4月19日，屯到先农坛（华北大学第二部）<sup>①</sup>报到入学<sup>[1]317</sup>。4月24日，喻世长和屯到一同到中国大学领了年刊，结束了在中大二年半的学程<sup>②</sup>。屯自己“毅然决定地考了华北大学”，喻世长觉得屯的“思想路子”比自己“正确”<sup>[1]307</sup>。

入华北大学后，学校先发了一套灰色制服（土布的）<sup>③</sup>，还有灰色军帽，喻世长觉得屯穿上，“在一些威武之气中，更显着妩媚了”，“好像身换了服装，人也换了思想”<sup>[1]320</sup>。确实，喻世长很快就感受到了屯的思想变化。

华北大学二部设有史地、国文、教育、外语、社科等系，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教育学和时事政策等。讲课教师有何干之、丁浩川、尚钺、李何林、何洛、蔡仪、谢韬等。教材有学校发的《社会发展史》《五种生产方式》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铅印本，参考书学员自己找。教学方式主要是上大课。先农坛的大殿为公共教室。教师讲，旁边有专人为他写板书，学生边听边记笔记。下课后回到学习小组里，大家对

① 1949年3月至8月，华北大学二部一分部在先农坛。洪流、王晋《华北大学的校址和校舍》，《华实录——华北大学回忆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② 1949年4月24日，第320页。北平和平解放之初，中大训导长吕复在无力复课情况下，向市军管会递交了请政府接管中大信件。中国大学自1949年3月26日宣告停办。教职员工多数转入华北大学工作，部分学生相继投考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军政大学或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简明词典》，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页。

③ 韩绍琦《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生活片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的黎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页。记载的是灰色的土布制服。

笔记，互相补充纠正，作为学习、讨论的依据。尚铨讲鸦片战争，谢韬讲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丁浩川讲解放区教育、观点，材料新颖，学员们前所未闻，非常感兴趣<sup>[12]</sup><sup>339</sup>。华北大学二部还请吴玉章、范文澜、聂真等为学员作大报告<sup>[13]</sup><sup>328、329</sup>。

范文澜指出，华北大学的“教学方法是自学辅导，发动同学们自由讨论，自我检讨，互相帮助，发扬自动自治的精神。”教务长钱俊瑞指出：“华大教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同学们建立替人民群众当勤务员的思想，克服只为个人利益打算，光宗耀祖的个人主义，和爬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他认为华北大学学习的方法“顶主要的是‘学用一致’‘理论与实践一致’”<sup>[14]</sup>。

华北大学有十几年的沿革，在1949年前已经培养出上十万的革命干部，“在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中，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sup>[15]</sup>。集体学习的力量在华北大学教育方法上是一个大革命。他们除几千人的大课外，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人数大约十人左右，集体读书，集体讲解，集体讨论，集体总结。在十人小组互相督促下，每一个人不得不努力看书，努力研究，前进的携带落后者，反复讨论，彻底了解。所以，三个月所学得的内容是普通大学二年也赶不上的，比灌输式的教育要深入。集体学习在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学员们不仅在学问上互相帮助，互相督促，并且在做人的思想和行为上也以最坦白的态度，互相帮助，互相督促，鼓励好的倾向，用集体的力量来纠正错误，所以经过短时间磨炼后，个个向上，人人努力<sup>[16]</sup>。

与1949年前的大学不同，华北大学的女生人数占较大比例。华北大学1950年4月至6月毕业的14526名学生中，女生为2805名，占总数的19%。针对女学生的特点，华北大学组织女生座谈会，设立女生委员会，鼓励女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多女学员在这个环节中从最初怕羞、

爱面子、怕得罪人，最后发展到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也敢于批评别人了。华北大学还积极发展女学员入党团组织。华北大学女生毕业时入团的人占女生总数的80%<sup>[17]</sup>。华北大学还请女作家丁玲等为学生们作报告，讲家庭问题、职业问题、男女关系和婚姻问题、集体生活和个人自由问题<sup>[18]</sup>。

学生“最初是带着各式各样的想法进华大”的<sup>[19]</sup>。根据华大展览会统计，华北大学的新生，一部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最多，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次之，二部大学文化程度的最多，占80%左右。出身方面，一部以学生为最多，二部以公教人员为最多。家庭成分方面，一、二两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占半数以上。政治情况方面，根据1949年8月1日统计，全校各部无党派占75%，国民党、三青团反动党派占百分之12.7%，民社党、三青团反动党派1.7%，中国共产党占6%，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占9.7%，其他民主党派占3%。这个统计显示，学生成分复杂。真正认识到入华大是为了学习和改造的占很少数目，例如，二部史一班105人中只有9人。学员入学，有的是为找职业，有的是来看看，有的认为华大是共产党的大学，毕业了位置高，可以保持铁饭碗；有的认为共产党胜利了，不得不把生活习惯换成革命的，穿上革命的外衣，取得革命的资格；有的认为无代价地换得共产党的理论是便宜的，获得了谋生资本，批发零售，再去出卖给无知识的人民<sup>[20]</sup>。

但经过三个月的改造，分配工作时学生们的动机都指向“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并表示，是中国共产党把他们“从落后的旧的思想重压下解放出来了”<sup>[21]</sup>。一部入学时，无党无派占90.12%，党员团员仅占1.9%。在学习过程中，涌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80%的人要求入团，出学时，团员占了总人数的27.69%，无党无派减为55.79%。教学实践证明，社会发展简史和中国近代史两种基本课程，在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

中起了最大的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造思想的最好武器。社会发展简史解决了劳动创造世界的劳动观点，解决了谁剥削谁与阶级斗争的阶级观点。近代史解决了谁是革命正统，谁是反动正统，从历史上认清了四个朋友三个敌人，无产阶级领导等问题。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及时根据学生们的思想情况进行教育，就能把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做好<sup>[21]</sup>。在毕业分配时，学生们表示一定服从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分配，革命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去<sup>[22]</sup>。由于华大“正确地执行了党关于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改造了知识分子”<sup>[20]</sup>，成果显著，艾思奇认为，华大所创造的教育经验、教学方法已成为当时“全国各地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普遍应用的方针和方法”<sup>[23]</sup>。社会上也认为，知识分子要改造“就得离开这一群，到部队里去，到华北大学去”。“四围都是改造了的人，自己也就容易改造了”<sup>[24]</sup>。

1949年4月17日，第一届团代会召开。全国有团员170000人，华北大学的团员人数近千人，比重还是不低的。1949年6月20日，华北大学党委发布的《关于加强建团工作领导的指示》明确指出，大量吸收进步青年入团，发展团的组织，是当前建团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党的重要任务……团组织要遵照团章规定，克服关门主义倾向，大胆放手地吸收团员<sup>[25]32</sup>。

屯之前在中国大学读书，深感中国大学的“腐败”<sup>[1]93</sup>，进入到华北大学这种全新的环境中，耳目一新，思想进步很快，难得周日和喻世长见面，吃着饭，还“说着思想改造的问题”<sup>[1]338</sup>。4月19日入学，5月底就当上了小组长，喻世长从自身经验出发，传授屯当小组长遇见困难时的解决“手段”和“策略”<sup>[1]343、353</sup>。到6月25日，屯就正式入团了<sup>①</sup>。对于华北大学的学生来说，入团在一定程度上象征新的政治生命开始。对屯来说，也是如此。屯自从入了青年团，每次和喻世长见面都与他“谈些她如何进步的事”<sup>[1]415</sup>。屯积极参加学校学习与其他各种事务，有时会影响

到与喻世长的见面。1949年9月3日是周六，下午学校课程结束后，屯原本应回家与喻世长见面，可因参加团员会到深夜，未能回去，喻世长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感觉“不知道是什么滋味”<sup>[1]410</sup>。

北平解放后，在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华北大学的改造下，屯的思想进步很快，喻世长认同屯的这种转变。但因为屯更多的时间在学校，减少了陪伴喻世长的时间，这令渴望着屯在身边的喻世长开始感觉些许失落<sup>[1]287</sup>。不过，喻世长此时也明白，时代不同了，“改变就有前途，有光明，有快乐，不改变就依然是处在矛盾与苦闷中”<sup>[1]306</sup>，“不能再完全以热泪般的情调去爱，不得不掺杂上一些生活问题”<sup>[1]282</sup>。同时，屯的进步也激励喻世长进行自我反省，“爱人已经决定重新学习了”，自己“还要落在后面吗”<sup>[1]308</sup>？

“爱情更多的是男性落魄时的一种需要，他们缺乏独立面对失败后焦虑与痛苦的勇气，爱情因其独特的对人精神的抚慰作用走进了他们的视线，在一定程度上，爱情有效地缓解了他们的精神焦虑。”<sup>[26]</sup>1949年后，喻世长面临着自己的思想问题、家庭问题、单位问题等，感觉很“苦痛”，希望屯能陪在他身边，给他安慰<sup>[1]306</sup>，但华北大学安排工作，所以喻世长隐隐担心，屯派到外地去，他“可怎么活的下去呢”，但又怕如果要求留在北平，就是不服从组织<sup>[1]379</sup> /

1948年喻世长就认真考虑过订婚的事，认为二人在一起屯才有进步，还认为自己在“生活上有三不死心，一是愿替人民服务，二是愿意自己有所成就，三是愿发掘无穷的爱的源泉”，而要“把这三件事统一起来”，就非等到和屯结了婚不

<sup>①</sup> 喻世长 《建国日记》，第362页。屯应该算是入团比较早的一批团员，因为据韩绍琦的一篇文章记载，他是7月8日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自认为可能是最早的一批团员，而屯比他还要早些。韩绍琦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生活片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的黎明》，第544页。

可<sup>[1]131</sup>。华北大学二部的学习时间一般是半年，屯4月份入学，到8月份快分配工作时，时间迫切，屯“自己也不确定能否被派在北平，喻世长就开始催促屯结婚的事。喻世长着急结婚，一是“因为和屯的爱已发出火花甚至火焰”<sup>[1]237</sup>，二是认为结了婚才能争取派在北平。喻世长自认是“是太自私”，但心里也认为离开屯“活不下去是真的”<sup>[1]400</sup>。相比较喻世长的焦虑，屯显得不那么着急，这让喻世长有些生气，教训屯，让她“正视生活问题”，告诉她“生活与革命史互为表里”<sup>[1]395</sup>。喻世长为结婚的事着急上火，还病了一场<sup>[1]400</sup>。屯心里爱着喻世长，明白喻世长的焦虑，再加上华北大学思想改造的进步，对于结婚开始有自己的看法，不再受家庭的影响，说“有了事实，胜于口头的报告”，决定马上结婚<sup>[1]405</sup>，并与喻世长就革命和恋爱是不是冲突的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二者并不“冲突”<sup>[1]411</sup>。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华北大学的学生经过半年的时间大都要离校，走上革命工作岗位。到1949年八九月份时，华北大学在北平招收的学生政治学习已经结束，二部第三期教育系、史地系、国文系、师资训练班的学生，9月有1700多人分配，有500人继续学习专业等待分配<sup>[25]40</sup>。屯是被留下的，学期要拉长<sup>[1]416</sup>。喻世长在9月初的时候就断定，屯不会离开北平<sup>[1]411</sup>，并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当月14日，二人申请登记结婚<sup>[1]419</sup>。

### 三、结婚后，喻世长、仲素纯“携手前进”

通俗地讲，“男女婚姻自由，就是由本人拿主意决定对象，不受父母或其他人的强迫包办或干涉”<sup>[3]3</sup>，“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sup>[27]29</sup>。从8月中旬喻世长正式考虑结婚，到9月18日二人举办了婚礼<sup>①</sup>，仅一月有余。1948年8月，喻世长曾考虑过订婚的事，但因屯的家人不同意，屯听从家里的安排遂作罢<sup>[1]131</sup>。这次在短时间内能够顺利结婚，屯

的态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喻世长最初采取的策略是希望屯在学校里先公开恋爱关系，再考虑结婚<sup>[1]400,403</sup>，循序渐进。屯的哥哥希望延迟时日，并且要多看组织上的意见<sup>[1]406</sup>，但屯自己决定马上结婚<sup>[1]405</sup>。喻世长对屯的这一决定反而在思想上存在矛盾：不等屯毕业早点结婚，可以“减少一些盼望与筹划之苦”；等她毕业再结婚，“可以减少一些匆遽与不安之苦”<sup>[1]406</sup>。

屯对于结婚的坚定态度让喻世长开始认识到屯的思想变化不小，婚后二人几次“思想深处”的交流，更让喻世长对屯“很钦佩”。二人谈到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矛盾的问题、爱情和革命是否矛盾的问题，屯清晰地表达了她的看法。屯说，“她在校中谈这个问题态度很坚定，丝毫没被温情所扰，如果组织要求她离平，她也没什么”。喻世长希望屯不要离开他，屯“勉励”他说，“不能太强调个人的条件”。喻世长认为，屯有这种认识，“已经能够把爱情从纯粹温情主义提高起来”，“她的思想进步已经不是表面的事，已经是有些能与实际沟通”，“不能再拿她当小孩看”。喻世长对屯的进步十分钦佩，并反省自己，自己还“不能清晰地判断出错误的根源与应改造的范围”，“没有能对问题有清晰的了解”，自己的思想需要改造。这种男女行动上、思想上携手“并肩前进”的爱情正是喻世长所追求的。不过，喻世长也感觉到他们的爱情关系“已经与几年前的有些质上的变化了”，因为一向都是自己“领导她”，现在自己还“要因为屯的许多帮助而改造”，“有些不甘心”<sup>[1]426,427</sup>。

婚后一周，喻世长还沉浸在与屯“相聚太短”的苦闷中时<sup>[1]438</sup>，屯就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学

<sup>①</sup> 喻世长 《建国日记》，第422页。从喻世长的日记可推知，1945年春天，喻世长对屯已经有好感，二人恋爱三四年后，1949年9月二人结婚。婚后二人在工作上互相鼓励，在家庭生活上互相帮助，相伴一生。1993年，屯患了老年痴呆症，喻世长全力照顾。1999年12月，喻世长病逝后，次年4月，屯亦因病离世。

校生活当中，并开始积极学习俄文<sup>[1]428</sup>。婚后的屯，性格也有了一些转变，“不像结婚前那样倔强易怒”<sup>[1]442</sup>。屯对于喻世长如何打算他们的前程都同意，并不觉得当时的生活苦<sup>[1]474</sup>。

认识到屯的思想进步，喻世长开始更多地与屯交换对工作、学习、前程、时政、家庭、思想改造，以及如何写自传等问题的看法。在与屯的思想交流中，喻世长往往能得到屯的意见和安慰。特别是在写自传过程中，屯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如指出喻世长犯了个人对自己的过去“太温情主义”，“总是把过去的一切不肯无情地否认”等，喻世长都接受了，并且觉得很宝贵，能够得到觉悟，使自己的思想更彻底地改造<sup>[1]541、587、626</sup>。在学校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屯不仅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庆祝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等<sup>[1]506</sup>，这使屯开始树立了“自立”意识，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事业<sup>[1]515、520</sup>，与喻世长一起承担家庭的重担。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sup>[27]80</sup>。1949年3月4日，屯开始了新的工作，被派到全国政协<sup>[1]567</sup>。同在北平工作，喻世长也就安心在北大工作了<sup>[1]569</sup>。想到屯要上班，开始新的生活，二人都很高兴。刚上班的屯对工作有些不适应，喻世长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如何作文书工作、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对待官僚主义作风等，给予屯许多指导与建议，并归纳了几条原则态度让屯掌握<sup>[1]579、606、624、630、644、648、651</sup>。

1949年5月份，喻世长得知有去贵州调查的机会，与屯进行了沟通，讲明了这次调研对于自己前途的意义，屯表现得“十分明智”，主张他去<sup>[1]619、630、650</sup>。长期以来，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心理上，屯一直依赖喻世长，所以喻世长担心自己走后屯“不能自主生活”，但屯向喻世长保证自己一定努力<sup>[1]654</sup>，不让喻世长有后顾之忧。

1950年7月出发去贵州后，喻世长一直担心独自在北平的屯，经常给屯写信，告诉她时代的

变化，以及自己对世界与人生的认识，指导她在单位的为人处世。进入华北大学后，在以改造思想为中心任务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下，屯的思想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改造与提高，学校的集体生活也锻炼了屯的生活能力。在喻世长走后的半年内，屯更是成长了不少，独自处理了很多事情，解决了单位里老干部存心排挤她的问题，取得了同事们的拥护，工作能力也得到了认可<sup>[1]644、700</sup>，同时还解决了房子漏雨和搬家等问题<sup>[1]700、773</sup>。

在此过程中，喻世长经常写信开导、劝慰屯，但主要是靠屯自己。屯把工作、生活处理得很好，给远在贵州调研的喻世长莫大的心理安慰，以致喻世长认为，自己“能够在新的工作新的场面中不迷惑，并且发挥出了聪明，都是她（屯）给我的”。屯在生活上的自立，让喻世长无后顾之忧，他在贵州才能“安然欣然生活工作下去”。屯在思想上、生活上能够与喻世长并肩前行，给了喻世长“十分大的鼓励与安慰作用”，这种“生活的美丽”<sup>[1]719</sup>，使喻世长有了精神，“思想渐渐复活”，又“感到生活的兴趣与活力”<sup>[1]753</sup>。这时的二人，虽然身处两地，但开始了真正的携手前进。

“觉醒的人，应当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sup>[28]556</sup>。“五四”以后，受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群体在婚姻观上发生了大的变化。在整个民国时期，普通知识青年是婚姻变化的主体，有时评认为“现在的学生不比从前的读书人；现在的学生是觉悟的学生，是受着新思想的学生，当然对于无知识的、未曾觉悟的女子不满意”<sup>[29]109</sup>。青年知识分子把是否受过教育作为选择配偶的主要标准之一，这种趋势到了20世纪40年代更为明显。1944年的河北蓟县县志记载：“近年男女注重求学，婚姻渐趋重知识矣”<sup>[30]57</sup>。喻世长作为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家庭“代表封建社会”<sup>[1]487</sup>，而“封建势力对知识



分子心灵的束缚，其实是最难堪的”，强烈地要“粉碎封建的遗骸”<sup>[1]230</sup>。所以，他不满父母命令式的包办婚姻，敢于冲破父母的藩篱寻找自己理想的爱人。这种巨大的勇气是“五四”之后知识分子所提倡并践行的。

婚姻制度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改革。在婚姻方面敢于反对父母包办，本质上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知识分子追求婚姻自由，自己选择配偶时，更加注重双方的学识、情感的沟通、对人生的态度等因素，在相处的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互敬、互爱、互助的真诚深挚的爱情，这才是结婚的前提。但同时知识分子也认识到，“要有一种充实一生爱情的材料，才不至结婚就是爱的终结”<sup>[1]55</sup>，而这爱情的材料，在1949年后的婚姻关系中，“除了彼此谈些思想认识外，还要看待对方工作、劳动和学习的态度是否积极”<sup>[3]11-12</sup>，男女双方能否从各个方面携手并肩进步。

“随着每一次社会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sup>[31]240</sup>婚姻和家庭的形态是社会的产物，是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婚姻与家庭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社会道德等综合的产物。社会制度改变了，上层建筑改变了，婚姻和家庭的形态也必然随之改变<sup>[32]2-3</sup>。对时代感受敏感的知识分子在政局变动中，主动向时代的号召靠拢。1949年后，喻世长的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同时也督促屯认识时代，追求进步。“妇女恰是1949年革命的最大受益人”<sup>[33]31</sup>。屯受过大学教育，通过华北大学的思想改造，进步很快，在短时间内就了解了社会形势，能与喻世长就思想改造、学习、生活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与交流。

在社会大变革中，政治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民众也会审时度势，选取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婚姻关系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在知识分子婚姻关系的改变中，国家的推

动必不可少，但知识分子自觉地调适也很重要。知识分子婚姻关系的变动正是这样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在受到政权变动影响较大的群体中，凡是婚姻关系发生了大的变动，都是主动与被动的结合，正因如此，整个社会婚姻家庭的变革才有综合的推动力，《婚姻法》颁布与实施才有了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 喻世长. 建国日记[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群力. 和职工们谈谈婚姻问题[M]. 北京: 通俗读物出版社, 1955.
- [4] 以空. 华北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待续)[J]. 群众(香港), 1948, 2(50).
- [5] 联大北大合并 成立华北大[N]. 人民日报, 1948-7-30(2).
- [6]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向中央并华北局、总前委的请示(1949年3月10日)[G]//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十八册(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九月)[Z].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 [7] 余飘. 华大纪念教师节 全校教员举行座谈 吴玉章同志号召培养各方面人材[N]. 人民日报, 1949-6-6(2).
- [8] 培养成千万革命建设人才 华北大学正式成立[N]. 人民日报, 1948-9-15(1).
- [9] 平津各界青年 踊跃投考人民大学 全国学代会代表陆续到平[N]. 人民日报, 1949-2-25(1).
- [10] 金凤. 三个人民大学在平招生万[N]. 人民日报, 1949-3-18(1).
- [11] 社会服务组. 华大革大军大继续招生有志青年可去投考[N]. 人民日报, 1949-4-1(4).
- [12] 中共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 [13] 任均泽. 回忆华北大学二部师资训练班[G]//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编写组. 血与火的洗礼: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回忆录(第2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 [14] 梁福义. 回忆华大生活 怀念尚钺老师[G]//血与火的洗礼: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回忆录(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15] 古化. 知识分子要下决心改造自己 记华北大第一区队开学典礼[N]. 人民日报,1949-3-19(4).
- [16] 范文澜. 校庆献辞[N]. 人民日报,1949-9-9(1).
- [17] 顾仲彝. 到解放区后我学习到了些什么? [N]. 光明日报,1949-7-2(3).
- [18] 乃茵. 改造女学生思想的几点经验[J]. 新中国妇女,1950(7).
- [19] 铁骨. 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今天作初步总结报告 赫鲁讲“伟大的毛主席”青年学园同学很感兴趣[N]. 光明日报,1949-8-10(4).
- [20] 金凤. 华北大介绍之一——“华大是一个大大学”[N]. 人民日报,1949-7-11(4).
- [21] 方明. 知识份子的改造过程 介绍华大一二两部教育工作[N]. 光明日报,1949-9-21(4).
- [22] 金凤. 华大五千学生行毕业礼 朱总司令叮嘱永远虚心学习[N]. 人民日报,1949-8-1(2).
- [23] 金凤. 华大全体师生热烈纪念校庆 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N]. 人民日报,1949-9-10(1).
- [24] 费孝通. 我这一年[N]. 人民日报,1950-1-3(5).
- [25] 王晋. 华北大学的历史与业绩及深远影响——为纪念华北大成立55周年而作[G]//王晋,汪洋. 华实录——华北大回忆文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26] 吴国如. 爱情,以革命的名义——革命文学与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革命与爱情’叙事范式比较论[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 [27] 熊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恋爱、婚姻和家庭[M]. 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
- [28] 唐俟(鲁迅).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J]. 新青年,第6卷第6号.
- [29] 陈鹤琴. 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J]. 东方杂志,1921,4(18).
- [30] 丁世良,赵放.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32] 马起. 中国革命与婚姻家庭[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9.
- [33] 凯琳·托马拉. 妇女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G]沙吉才. 当代中国妇女地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张作成]

## 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s Marriage Relationship Before and After Liberation

——A Case Study of Zhong Suchun and Yu Shichang

DING Rui

**Abstract:** After liberation, with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changes, the status of women was improved. Women had changed from subordinate status to equal status in the famil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had also changed in marriage. This change wa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intellectual conjugal relation. Before liberation, Yu Shichang and Tun had been in love for several years and had stable relationship, however, Yu Shichang was the leader of their relationship and often feel that Tun “was not active.” After liber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era, Tun took the initiative to change ideology and Tun’s self-consciousness had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family relations, they “went forward hand in han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on people’s life had never been one-way, and the people would judge the hour and size up the situation as well as adjusting themselves consciousl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libe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s’ marriage relationship wa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s will.

**Key words:** Intellectual Marriage Relationship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Liberation.